

← (上接9版)

月,张传玺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项羽论评》,与杨翼骥商榷。张传玺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尽管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旧贵族利益的立场上,是为了挽救其本阶级没落的命运的,在整个反秦斗争中没有转变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起义,从而否定了项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此文发表之时,从山东大学历史系肄业的张传玺尚在山东青岛一所中学做教员,凭借此文,张传玺一举成名。

《文史哲》一直保持了提携新人的传统。李振宏先生,1980年还是河南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他,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对宋史权威漆侠在《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一文提出的“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提出质疑。李振宏认为,漆侠的观点缺乏理论根据,在典型的封建时

张传玺
(1927—)

代是绝不可能产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把封建时代的农民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拔高对农民的估价,而把民主主义这个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并且适应这种关系发展的要求才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随便搬到别的历史时代去,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都做了报道,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文史哲》与新观点

《文史哲》在刊登稿件方面常常有不同凡俗之处。1954

年,《文史哲》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这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一篇学术文章连载18期,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1956年8月,何兹全在《文史哲》第8期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魏晋封建说”。由于这一观点与当时的“古史分期”主流观点相去甚远,发表时颇费周章。何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与此最合拍。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

成了反对毛泽东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也不敢说话了。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19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活跃起来。我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时任《历史研究》主编)曾拿给郭沫若(时任《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看,也不知是郭沫若还是尹达下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文章未获刊用)后来,我拿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1956年5月,高亨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诗经引论》,试图打破按照风、雅、颂分类来研究诗经的惯常做法,转而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阶级构成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入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诗经。这一做法



在北大读书时的何兹全(1911—2011)

当即引起争议。9月,《文史哲》第9期发表读者王迺扬的《读高亨先生“诗经引论”》,直截了当指出高亨此文存在的诸多问题。文章指出,马列主义对待事物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待古典文学作品,尤其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根据个人主观意图给作品以主观的解释。高先生在某些地方却忽视了这一点,这表现在对某些诗篇的牵强附会上,比如对于陈风月出,高先生理解为“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诗”,说什么“这一篇抒写在月色惨白的杀人场,一位英俊的人民,身被五花大绑,被领主杀死了,尸体被领主焚烧了,这时枝干盘曲的老橡树,在怒吼,在颤摇,作者的心灵,在忧愁,在跳动,在悲痛。这是凄惨壮烈的一幕悲剧”。其实这首诗分明是一首恋诗。在形式上是采用民歌中常见的反复讽诵的格式,三章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只能看出“一种浑然的怀念情绪,根本感不到是一幕“凄惨壮烈”的悲剧;我们只能意识到一个恋人在皎洁的月光底下怀恋着意中的美人,根本看不到一位“身被五花大绑”的“英勇的人民”被杀死。其时,高亨正任山东大学教授,而且担任《文史哲》编委。《文史哲》编辑部并未因为质疑“淹贯六经,诸史旁通”的大学者(而且这位大学者还是同事)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者就采取无视的态度。

“文革”刚结束时,《文史哲》还曾发表过一篇引起巨大震动的文章。1972年,为适应儒法斗争需要,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将中国文学史改写成儒法斗争史,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1977年11月,身为古典文学研究巨擘的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了《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予以批驳。其时,“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仍

大行其道、“批儒尊法”余音未消,《文史哲》发表这位“摘帽右派”的14000字长文,可谓惊世骇俗。据陆侃如的学生龚克昌回忆:

1977年夏,陆师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长信,问我能不能在《文史哲》上发表……此信在大半年前寄给刘先生,刘先生没有回信,故他寻求在《文史哲》发表。(刘大杰是否回信,由牟世金、龚克昌撰写的《陆侃如传略》与此说法有异,传略有言,“这篇文章不仅看得准,而且驳得有力,刘大杰先生本人很快就复信,同意陆先生的意见”,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笔者注)我以为此信写得很好,用事实说话,征得主编蒋捷夫同意,就安排在《文史哲》1977年第4期上发表。陆师此信完稿于1976年11月1日,他当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刘禹锡诗文选注》编写组的“壮劳力”,此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从信中所说的他“对杜集再读一遍”推测,陆师酝酿写此信必在1976年夏秋,而那时正是毛泽东病重,“四人帮”横行之时。当时大家都意识到,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有背景的,“四人帮”中的某些人在起作用。聪明过人的陆师不会想不到,但他却偏要去批逆鳞,可见其胆识之不一。——顺便说一下,此信发表后,蒋捷夫主编告诉我,告状的人还真不少,说为什么给他这种人发文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权威人士都说,陆师信是《文史哲》1973年复刊后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我心目中的陆侃如先生》,《文史知识》2003年第8期)

无独有偶,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郭沫若一改此前对杜甫的高度赞扬,转而认为李白代表法家,杜甫代表儒家,指斥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郭在书中多次点名批评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为此萧涤非受到很大压力,长期未有文章面世。1979年6月,在郭沫若去世一年之后,萧涤非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从“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个方面对郭沫若进行反批评。作为“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其时,郭沫若在学术界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史哲》此时发表反驳郭沫若的文章,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学人在讲

◆洪水与创世

主讲:拱玉书(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时间:7月8日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阿姆河宝藏——古波斯帝国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主讲: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时间:7月8日10:00-12: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远古人类的世界

主讲: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时间:7月9日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古典文化在中世纪的传承

主讲: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间:7月8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从文献到文本研究的反思

主讲: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间:7月9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各地的联袂

主讲: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时间:7月15日10:00-12: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大工业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主讲:李大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教授)

时间:7月16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弥达斯神话与弗里吉亚考古

主讲: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间:7月16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